

梁启超，字卓如，号任公，1873 年 2 月 13 日生，广东新会人。梁乃康有为的得意门生，蔡锷的恩师，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，护国运动的幕后策划人，当年清华园四大名教授之一。梁启超一生著述 1400 万字，19~20 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人，没有人没有受过他的文字洗礼。严复曾如此描述梁氏文章当年呼风唤雨、撒豆成兵的本领：梁启超“主暗杀，则人因之而翕然暗杀；主破坏，则人又群然争为破坏”。

“言论界之骄子”

——梁启超

梁启超的报人生涯始于创办北京维新团体的《万国公报》。该报 1895 年 8 月 17 日创刊，双日出版，每期一千多份，委托《京报》代递，分送朝士，不收报费。刊登内容以介绍西方各国社会、政治、经济、历史、地理、风物、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知识为主，转录西方消息，阐发维新改良主旨。每期有一篇言论，多出自梁启超的手笔。1895 年 12 月 16 日，《万国公报》改称《中外纪闻》内容较前丰富。

梁启超后来回忆说，此报办理月余，居然每日发行 3000 份上

下。清廷守旧官僚攻击该报贩卖西学，要挟外省大员，破坏社会安定，奏请朝廷查禁。1896年1月23日北城出示拿人，衣服用具书籍尽皆抄没。梁启超逃到寺院藏匿数月，“益感慨时局，自审舍言论外未由致力，办报之心益切”。

“河出伏流，一泻汪洋”

1896年8月9日，《时务报》创刊于上海四马路，由汪康年和梁启超分任经理和主笔。黄遵宪个人为该报捐款1000元。《时务报》是梁启超人生的发皇期。这份报纸总共出版了69期，梁启超撰文达60篇，其中《论报馆有益于国事》、《变法通议自序》等成为后来的经典性文章。

当时正值甲午中日战争失败之后，群情激奋，《时务报》鼓吹变法自强，抨击时政，反映民众呼声，加以梁启超文笔流畅，笔锋常带感情，一时风靡海内。数月之间，行销上万份，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，举国趋之，如饮狂泉。此时，梁启超正值20出头的年纪，精力充沛，思维敏捷，言辞犀利。后来他曾这样激动地回忆起那一段难忘的岁月：

每期报中论说四千余言，归其撰述；东西各报一万余言，归其润色；一切公牒告白等项，归其编排；全书报章，归其复校；十日一册，每册三万字，启超自撰及删改者几万字，其余亦字字经心。六月酷暑，洋蜡皆变流质，独居一小楼上，挥汗执笔，日不遑食，夜不遑息。……上自通都大邑，下至僻壤穷陋，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。

当时社会名流对梁启超的办报成绩备加赞誉。张之洞在其《劝学篇》中说道：“乙未以来，志士文人开创报馆，广译洋报，参以博议，始于沪上，流行于各省，内政外事学术皆有焉。虽论说

纯博不一，要可以扩见闻，长志气。……孔之士，山泽之农，始知有神州；筐篚之吏，烟雾之儒，始知有朝局，不可谓非有志四方男子学问之一助也。’黄遵宪称：‘梁卓如乃旷世奇才。’陈三立说：‘今窥一斑，益为神往。’严复则称梁启超：‘自甲午以后，于报章文字，成绩为多，一纸风行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。’”

《时务报》将梁启超推上人生第一个成功的峰巅。1897年初，梁启超在武昌拜会洋务派头面人物张之洞。张之洞破例开武昌城中门迎接梁启超，此乃接待钦差或督抚的礼遇。张之洞意犹未尽，问属下可不可鸣炮。那天正值张之洞之侄结婚大典，张之洞却客不纳，与梁启超畅谈，至二更乃散。张之洞盛情邀请梁启超出任两湖时务院长，月千二百金，梁启超婉言拒绝。

梁启超报刊生涯的顶峰是《清议报》和《新民丛报》时期。

1898年9月，戊戌变法失败，梁启超在日本驻华使馆的帮助下，剪辮化装，逃离京津。一路上，清军围堵，险象环生，直到所乘日舰驶离塘沽，梁启超才惊魂稍定。

流日十三年，执言论之牛耳

流亡到日本的梁启超，于1898年12月创办了《清议报》。其宗旨在于维持清议，激发国民之正气、增长学识、交通中日两国之声气以联结其情谊、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。每10天一册（一期），每册40页，内容丰富，形式多样，发行3000份，行销中国本土、日本、朝鲜、南洋、欧美、澳洲等地。

梁启超在《清议报》上极力抨击清廷昏聩腐朽，专制独裁，倒行逆施，歌颂光绪皇帝，鼓吹民权，评论时事。后来，他曾把《清议报》的总体精神概括为“广民智，振民气”。国内许多青年，正是从《清议报》获得进化学说和人权观念的启蒙。

《清议报》共出版 100 册，梁启超在上面发表文章 100 多篇。《清议报》出到第 100 册，梁启超在该册上发表第 100 册祝词。第 100 册《清议报》刚出版，报馆失火，被迫停刊。

1902 年元旦，《新民丛报》创刊。梁启超为其设定三项宗旨：

本报取《大学》新民之义，以为欲维新吾国，当先新吾民。中国所以不振，由于国民公德缺乏，智慧不开，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，务采合东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，广罗政学理论，以为智育之原本。

本报以教育为主脑，以政论为附从，故于政治亦不得不详。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，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，不暇沾沾词费也。

本报为吾国前途起见，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。持论务极公平，不偏于一党派，不为灌夫骂座之语，以破坏中国者，咎非专在一人。不为危险激烈之言，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。

《新民丛报》半月一期，朔望日发行，专栏达 25 个之多，如图画、论说、学说、时局、政治、史传、地理、教育、宗教、学术、农工商、兵事、财政、法律、国闻短评、名家谈丛、舆论一斑、杂俎、问答、小说、文苑、新著介绍、中国近事、海外汇报、余录等等。梁启超在写给康有为的信中说：“《新民丛报》销行之旺，真不可思议，每月增加一千，现已近五千矣，似比前此之《时务报》尚有过的而无不及。”

《新民丛报》最高发行量达 1.4 万份，仅国内就有 97 个发行点，遍布 49 个县市，边鄙地区皆有其读者。梁启超被刊物的巨大成功鞭策着，撰稿不遗余力，时有一天撰稿 5000 言者。

梁启超十分重视小说在启迪民智上的作用，与主编《新民丛报》同时，他还创办了中国第一份小说专门杂志《新小说》。他在

该刊首期写道：

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自来乎？小说也。吾中国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？小说也。吾中国人江湖盗贼之思想何自来乎？小说也。吾中国人妖巫狐兔之思想何自来乎？小说也。

欲新一国之民，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；欲新道德，必新小说；欲新宗教，必新小说；欲新政治，必新小说。

十几年后，梁启超在撰写《清代学术概论》时，忆及《新民丛报》和《新小说》，不无自豪地说道：

自是启超复专以宣传为业，为《新民丛报》、《新小说》等诸杂志，畅其旨意，国人竞喜读之，清廷虽严禁不能遏。每一册出，内地翻刻本辄十数。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，颇蒙其影响。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，幼年为文，学晚汉魏晋，颇尚矜炼，至是自解放，务为平易畅达，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，纵笔所至不检束，学者竞效之，号新文体。老辈则痛恨，诋为野狐。然其文条理明晰，笔锋常带情感，对于读者，别有一种魔力焉！

梁启超这种别有魔力的新文体，风靡一时。世人誉其为“言论骄子”。梁启超给世纪初的一代中国读书人施以思想的洗礼。

黄遵宪在给梁启超的信中称：

《清议报》胜《时务报》远矣，今之《新民丛报》又胜《清议报》百倍矣。惊心动魄，一字千金，人人笔下所无，却为人人心中所有，虽铁石人亦应感动，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，无过于此者矣。罗浮山洞中一猴，一出而逞妖作怪，东游而后，又变为《西游记》之孙行者，七十二变，愈出愈奇。吾辈猪八戒，安所容置喙乎，惟有合掌膜拜而已。

黄遵宪比梁启超年长一二十岁，一向器重梁启超。后来在他给梁启超的另一封信里，对梁启超《新民丛报》的卓越成就，又

一次给予热情洋溢而又语重心长的评价。

严复在致友人的信中说道，梁启超“主暗杀，则人因之而翕然暗杀；主破坏，则人又群然争为破坏”，足见当时梁启超文字的煽动性和号召力。

胡适在其《四十自述》里回忆少年时代读《新民丛报》的情形：“梁先生的文章，明白晓畅之中，带着浓厚的热情，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，不能不跟着他想。”

试读梁启超两段新文体的文字：

起起起！我同胞诸君！起起起，我新中国之青年！我辈实不可复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，吾辈实不可复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！专制政体者，我辈之公敌也，大仇也，有专制则无我辈，有我辈则无专制。我不愿与之共立，我宁愿与之偕亡！使我数千年历史以脓血充塞者谁乎？专制政体也。使我数万里土地为虎狼窟穴者谁乎？专制政体也。使我数百兆人民向地狱过活者谁乎？专制政体也。……专制政体之在今日，有百害于我而无一利！我辈若犹蹊然恭然，与之并立于天地，上之无以对我祖宗，中之无以对我自己，下之无以对我子孙。我辈今组织大军，牺牲生命，誓翦灭此而后朝食。壮行何畏，师出有名，爰声其罪，布告天下，咸使闻知。

这是梁启超《拟讨专制政体檄》的一节。下面是他《少年中国说》中的一段文字：

欲言国之老少，请先言人之老少。……老年人如夕阳，少年人如朝阳；老年人如瘠牛，少年人如乳虎；老年人如僧，少年人如侠；老年人如字典，少年人如戏文；老年人如鸦片烟，少年人如波兰地酒；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，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，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；老年人

如秋后之柳，少年人如春前之草；老年人如死海之涸为泽，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。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。

在《新民丛报》的鼎盛时期，梁启超一度到北美新大陆漫游。经过对北美社会和华人社会的考察，经过与革命党人深切的接触，梁启超最终还是回到改良主义立场上来。此时，革命党的机关报《民报》周围兵强马壮，人才济济。革命与改良两派的对立，首先在各自的喉舌报刊上突现出来。

1903年6月，还在旅美途中，梁启超就对中国时局发表了新的看法：“中国之亡，不亡于顽固，而亡于新党。”结束漫游，回到日本后，梁启超连续发表《敬告我国民》、《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》等文章，强调国民素质太低，只可以受专制，不可以享自由，而且中国无革命倒还罢了，一旦革命，必定玉石俱焚，靡有孑遗。“非有不忍破坏之仁贤者，不可以言破坏之计；非有能回破坏之手段者，不可以事破坏之事”。因而，当务之急乃是陶冶锻炼吾国民，20年、30年乃至50年后，方可与言华盛顿之事。

《民报》发表汪精卫等人《民族的国家》、《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》等文章，对梁启超的一系列思想观点予以回击。由此开启战衅的这场论争历时两年多，改良派与革命派双方在国内外的20多家报刊投入论战，辩难文字不下百万言。论题集中起来有要不要革命，要不要推翻清政府，要不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，要不要解决土地问题等等。

这场论战以《新民丛报》的最后停刊划上句号。

1906年11月，梁启超通过其同党友人徐佛苏向革命党表达停战意向，以后双方和平发言，不再互相攻讦。梁启超本人还以同乡身份邀请汪精卫商谈停止论战事宜。革命党一方则穷追猛打，务必犁庭扫穴，不留余地。《新民丛报》不得不单方面宣布停战。

从此以后，梁启超作为言论骄子的黄金岁月基本结束了。

这年隆冬，梁启超蛰居横滨乡下，回想七八年来万里投荒，人生无着，倍觉黯然神伤，写下如下诗行：

泪眼看云又一年，倚楼何事不凄然。

独无兄弟将谁慰，长负君亲只自怜。

天远一身成老大，酒醒满目是山川。

伤离念远何时已，捧土区区塞逝川。

一篇文章，二十万金

1912年，中华民国成立，梁启超终于结束了流亡生涯，回到阔别十多年的故国。此后的几年，梁启超最大的愿望是推拉袁世凯走上真正的宪政之路，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。无奈所遇非人，袁世凯的梦想是当皇帝。40来岁的梁启超，经历了人生所能经历的一切风浪之后，政治上已是万念俱灰。

1915年新岁，梁启超在远离政潮的清华园决定应邀主编《大中华》杂志。这年元月，《大中华》创刊，梁启超写了发刊词。此时，袁世凯复辟帝制活动紧锣密鼓，热火朝天。目睹袁世凯倒行逆施、国事日非的现实，梁启超在发刊词中愤恨地写道：“举国沉沉，悉含鬼气。”

这个月里，梁启超还写了《吾今后所以报国者》一文，平生第一次发表脱离政治的宣言：“自今以往，除学问上或与二三朋辈结合讨论外，一切政治团体之关系，皆当中止。乃至生平最敬仰之师长，最亲习之友生，亦惟以道义相切磨，学艺相商榷。至其政治上之言论行动，吾决不愿有所与闻，更不能负丝毫连带责任。”

梁启超退出政坛的宣言引起袁世凯的注意。一天，袁世凯长子袁克定邀请梁启超到汤山温泉赴宴。梁启超应约前往。席间，袁

克定突然发问：“近来外间群议汹汹，皆言共和制不合中国国情，卓如先生有何高见？”

梁启超开诚布公：“辛亥革命，共和建立，中国只可前进，断无倒退之理！”

此次探测梁启超口风的聚会不欢而散。

其时，袁世凯与日本的“二十一条”谈判也正在进行中，梁启超接连发表八篇文章，严加驳斥。日本当局以曾为梁启超提供十多年的政治庇护为由，指责他忘恩负义。他正告日方：“凡以正义待我者，无论何国，我皆友之；凡以无礼加我者，无论何国，我皆敌之！”

这年8月，袁世凯的宪法顾问、美国人古德诺，在袁世凯授意下，发表《君主与共和论》，诬蔑中国民智低下，不适合建立共和国。不久，袁世凯的法律顾问、日本人有贺长雄也炮制文章，为袁世凯帝制丑剧鸣锣揭幕。袁世凯又花巨资买下英国《曼彻斯特卫报》一个版面，刊载上述二人的文章，并令人译成中文，交上海《亚细亚报》发表。

乌烟瘴气的复辟闹剧，终于使梁启超忍无可忍：“吾实不能坐视此辈鬼蜮出没，除非天夺吾笔！”一篇传诵一时、令人拍案叫绝的鸿文《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》草成了。梁启超在此文中写道：

自辛亥八月以来，未盈四年，忽而满洲立宪，忽而五族共和；忽而临时总统，忽而正式总统；忽而制定约法，忽而修改约法；忽而召集国会，忽而解散国会；忽而内阁制，忽而总统制；忽而任期总统，忽而终身总统；忽而以约法暂代宪法，忽而催促制定宪法。大抵一制度之颁，行之平均不盈半年，旋即有反对之新制度起而推翻之，使全国民彷徨迷惑，莫知所从，政府威信扫地以尽。……何苦无风鼓浪，兴妖作怪，徒淆民视听而貽国家无穷之戚也！

袁世凯立即派人给梁启超送来 20 万元巨款，央求梁启超勿发此文。梁启超婉言辞谢，并将此文誊录一份交给袁世凯。与此同时，梁启超还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，断然表示：即令全国四万万人中，三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赞成复辟帝制，而梁某一人断不能赞成也！

袁世凯派人威胁道：“你亡命十多年，此中况味遍尝之矣，何必再受二次苦？”梁启超回应道：“我梁某乃老于亡命的经验家也，我之所以宁肯如此，实在不愿苟活于此五浊恶世之中！”

1915 年 9 月 3 日，北京英文《京报》的汉文部赫然刊出《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》。此文一出 举世哗然。《京报》即日售罄 茶馆、旅馆因无《京报》可卖，只得向人辗转抄读。许多人到《京报》报馆门口，要求再版。

次日，《国民公报》予以转录。然而《国民公报》限于篇幅，未能一次登完，到 4 日、5 日，每到一机关一社会场所，人们彼此见面仍然还互问：“君有 3 日的《京报》否？昨天今天的《国民公报》也可以。”这种满城争购的情形，到 6 日仍然在持续着，《国民公报》于是宣告，7 日将把梁任公此文印成单行本发售。

梁启超自 1912 年 11 月结束十余年的流亡生涯回到故国以后，一直以妥协换合作，梦想拉着袁世凯走宪政之路，国人因此诟病于梁。此文发表，人们才又一次看到那个依然慷慨悲歌、言论救国初衷不改的梁任公。维新时期的梁启超又回来了！

之后，梁启超写信鼓励门生党徒：纵使袁世凯倒行逆施，也要勇举义旗。如此必将全国昭苏，响应风从，即有危险，岂容却顾！梁启超和他的门生故旧们终于走上了密谋反袁之路，不再回头，不再瞻顾。

“从诸贤之后，以与袁公相见于疆场”

1915 年 12 月，梁启超在与得意门生蔡锷密谋决定武装反袁之后，秘密南下上海。行前，他致长函于袁世凯，再次奉劝其放弃帝制，回归共和。信中写道：

启超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，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做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；愿我大总统之荣誉与中国以俱长，不愿中国之历数随我大总统而斩。

信之末尾，他竭尽忠言，奉劝袁世凯好自为之，莫逆世界潮流。

此函之后，一向反对兵戈的梁启超自觉对袁世凯已经仁至义尽，终于“毅然决然挥泪沥血，从诸贤之后，以与袁公相见于疆场”。

在整个护国运动中，梁启超“定策于恶网密布之中，冒险于海天万里之外”，同时屡撰通电、檄文，对袁世凯恶行恶德痛加鞭挞。

在不久发表的《袁世凯之解剖》一文中，梁启超讽刺袁为“黑暗时代东方之魔怪人物”。

在护国军的军事打击和梁启超强大的舆论攻势之下，“既揽万事于一身，又万事不负责任”的袁世凯，人心丧尽，众叛亲离，最终一命呜呼。以梁启超为幕后总策划人的护国战争胜利了，这是梁启超一生中从事的所有政治活动中惟一获得成功的一次。

袁世凯死后，中国并没有得到片刻的安宁，接着就是军阀政客政争不休，最终酿成张勋复辟丑剧。梁启超一如既往，反对复辟。

1917 年 7 月 1 日，张勋通电全国，咒骂辛亥革命，拥戴清废

帝溥仪，恢复大清国。³ 日，梁启超即代段祺瑞起草《讨伐张勋复辟檄》，向全国发布：“天祸中国，变乱相寻。张勋怀抱野心，假调停时局为名，阻兵京师，至 7 月 1 日遂有推翻国体之奇变……”

同时，梁启超又以个人名义发表《反对复辟电》，指出：“此次首造逆谋之人，非贪黷无厌之武夫（指张勋），即大言不惭之书生（指康有为），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。”对乃师亦不稍迁就。他断言：“就外交论，就财政论，就军事论，此滑稽政府皆绝无可以苟延性命之理。虽举国人士噤若寒蝉，南北群帅袖手壁上，而彼之稔恶自弊，吾敢决其不逾两月。”

的确，7 月 8 日，康有为化装逃入美国使馆，12 日张勋逃往荷兰使馆，复辟丑剧只上演了 12 天就草草收场了。

“孰为公死，凛凛犹生”

张勋复辟失败以后 段祺瑞出任总理 梁启超任财政总长。上任不足 4 个月，段祺瑞内阁倒台，梁启超一并辞职。“好攘臂扼腕以谈政治”的梁启超，对中国政治彻底失望了。1918 年 10 月，他对《申报》记者发表谈话，称心思才力，不能两用，涉足政治，势必荒著述，“吾自觉欲效力于国家社会，毋宁以全力尽瘁于著述，为能尽吾天职，非俟著述之愿略酬，决不更为政治活动”。此后十年余生，梁启超彻底退出政坛，致全部心力于文化教育事业。其中与报刊关系较重大的活动有主编《改造》杂志，参与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，以及调解科学与玄学的论战等。

《改造》杂志原名《解放与改造》，1920 年 9 月第三卷第一号起改名《改造》由梁启超担任主编。梁启超在发刊词中提出 16 点主张，实际上是以他为主帅的研究系同人在新时期里政治、经济、

文化思想方面的行动纲领。

政治上，梁启超提出缩小中央权限，实行地方自治。经济上，发展资本主义，同时力求实现社会平等。思想文化上，反对大一统，要汲取世界文化精华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，融合中西，对世界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。军事上废除常备的国防军，实行兵民合一。教育上，提出普及教育，提高国民素质。总而言之，梁启超一系列的改革中国社会的思想，归结起来即经济上的改良，政治上的分权，文化上的自由主义。后来，他与社会主义传播者的分歧，调解科玄之争，皆是这些主张的外化。

五四运动前后是中国两千年一见的思想、学说百家争鸣的时代，民主主义、国家主义、无政府主义、马克思主义、修正主义，彼此竞争。社会主义在诸多学说中逐步脱颖而出，日渐占据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。

梁启超对社会主义并不陌生，早在戊戌变法前他主编《时务报》时期，就开始介绍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动态，如第二国际伦敦会议消息，西班牙社会主义者和德国社会党的有关情况。《新民丛报》时期，梁启超开始介绍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片段。他称马克思是社会主义运动的鼻祖，认为社会主义是将来世界最高尚最美妙的主义，必于 20 世纪磅礴于世界。十月革命后，社会主义在中国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。它的以暴力革命学说为中心的一套理论，与梁启超一向温和改良的主张开始发生直接的冲撞。

1920 年 9 月，梁启超邀请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。罗素认为，中国实业不发达，阶级分化不够充分，因而阶级斗争观点不适合中国。梁启超和他的同志们借罗素此行，对中国萌芽状态的社会主义运动提出批评。12 月，张东荪在《改造》杂志发表《现在与将来》。不久，梁启超在《改造》上发表《复张东荪书论

社会主义运动》，系统阐述其反对社会主义的观点。

梁启超认为，中国没有劳动阶级，中国不同于欧洲美国，中国的迫切问题是使多数人有工可做，成为劳动者，因为中国十之八九的人是欲求一工作而不得。所以中国当务之急是发展资本主义，使人人有工做。连起码的工作都没有，谈何阶级？又何来的斗争？所以梁启超写道：“舍生产事业发达，其道无由。生产事业发达，凡吾国人消费所需，皆由吾国人自生产而自供给之。我之需要品，不必仰给于伦敦、纽约、巴黎、大阪，然后我多数人之职业，不致为伦敦、纽约、巴黎、大阪之劳动者所夺，然后我之游民可以减少，而我之劳动阶级可以成立。劳动阶级成立，然后社会运动得有主体，而新社会可以出现。社会运动不可逾越之阶段，殆如此。”

此后，梁启超又相继发表许多演说和文章，坚持中国“火烧眉毛的只是生产问题”的观点。这些观点长期以来被称为改良主义，遭到批判。

1923年，中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一场科学与玄学的大论战。这年2月，张君勱在清华做了一次人生观的讲演。他认为，科学是客观的，人生观是主观的；科学是理性的，人生观是直觉的；科学是分析的，人生观是综合的；科学是讲因果的，人生观是讲自由意志的。因此，科学与人生观不相容，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，科学只可说明自然现象。

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（在君）对张君勱的演说大不以为然。⁴ 4月，丁文江在《努力》周报上发表《科学与玄学》一文，为科学辩护，说张君勱是玄学鬼附体，要打这个玄学鬼。丁文江说，无论是关于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学问，都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加以分析研究，人类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就是把科学应用到人生问题

上去。

张君勱和丁文江的辩论，引起整个思想文化界的关注，反响很大。胡适、吴稚晖等支持丁文江的观点，张东荪、杜宰平等则认可张君勱的主张，而陈独秀和瞿秋白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阐述自己的看法。此次辩论范围之广，参与者之多，是近代思想史上罕见的。

论战正酣之时，梁启超正在北京西郊翠微山养病。鉴于辩论双方皆自己门生故友，梁启超担心如此进行下去势必伤友情，便于5月9日发表一篇《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“战时国际公约”——暂时局外中立人梁启超宣言》，为交战双方拟订两条“战时国际公约”：一是问题要集中，针锋相对，剪除枝蔓；倘若因一问题引起别问题，宁可别为专篇。二是措辞务必庄重恳挚，万不可嘲笑谩骂；倘若一方偶然不检，对方不可效尤。

拟订“公约”之后不久，梁启超守不住中立了，也加入论战。29日，梁启超发表《人生观与科学》一文，说：“我不是加在哪一造去‘参战’，也不是想斡旋两造做‘调人’，尤其不配充当‘国际法庭的公断人’。我不过是一个观战的新闻记者，把所观察得来的战况随手批评一下便了。……我所批评的一点不敢自以为是。”

在梁启超看来，张君勱所说的不能用科学方法解答的问题，有十之八九倒是要用科学方法解答的。张君勱的尊重直觉，尊重意志，梁启超也本是赞成的，只是应用得太广了，而且有些疏漏。丁文江则过分相信科学万能，很像专制宗教家，殊非科学的态度，正和张君勱之轻蔑科学一样，有其不足之处。

那么梁启超本人是如何看待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的呢？他先给这两个概念下定义：

人类从心界、物界两方面调和结合而成的生活，叫做人生。我

们悬一种理想来完成这种生活，叫做人生观。根据经验的事实，分析综合，求出一个近真的公例，以推论同类事物，这种学问叫做科学。

在此概念的基础上，梁启超得出结论说：“人生问题，有大部分是可以，而且必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，却有一小部分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学的。……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，绝对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；关涉情感方面的事项，绝对的超科学。”

梁启超还特别提出两种情感的神秘性：“情感表现出来的方向很多，内中最少有两件的的确确带有神秘性的，就是爱和美。科学帝国的版图和权威无论扩大到什么程度，这位爱先生和那位美先生依然永远保持他们那种‘上不臣天子，下不友诸侯’的身份。”

科学与玄学大讨论之后，作为“言论骄子”的梁启超就真正进入烈士暮年时期，凡事虽壮心不已，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。此后的中国，已经与梁启超没有太多的关系了。1928年10月12日，梁启超强支病体写作辛弃疾年谱。恰写到朱熹往吊辛弃疾的四句诗“所不朽者，垂万世名，孰为公死，凛凛犹生”时，梁启超手中那支曾经得意非常的凌云健笔，此刻山倾玉倒一般再也扶不起来。“生”是梁启超一生1400万字著述中写就的最后一个字……

胡适，字适之，祖籍安徽绩溪，1891 年 12 月 17 日出生于上海，当时他的父亲 50 岁，母亲 18 岁。1910 年，胡适考取第二批庚款留学生赴美。7 年之后，26 岁的胡适应蔡元培、陈独秀之邀任教于北京大学，并因其全新的授课和为《新青年》撰稿鼓吹新文学新文化运动而“暴得大名”。在胡适声誉至隆之时，家里经常高朋满座，“引车卖浆之徒”也可以登门或请教或谈天或前来观瞻这只“下蛋的母鸡”。胡适一生共获 35 个博士学位。据说，在美国一次社交活动中，一个未尝谋面的美国人拉着胡适的手，向胡适打听“我的朋友胡适之”近来如何。“我的朋友胡适之”一典虽没长腿，却从此走遍世界。

“我的朋友胡适之”

—— 胡适

1906 年，15 岁的胡适考进中国公学。中国公学是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，它的创办者和师生多半是留日的革命党。胡适后来回